

漫漫求学路——纪念中国恢复高考40年

(三) 医生梦

(本文<二>见2017年11月17日第B3版)

建材厂的篮球生活

建材厂的男女篮球队在厂里很受欢迎。当时很少有人家里有电视，娱乐活动不多，每次篮球比赛都是厂里的大事，观看助威的人是里三层外三层。

73年西安建材局成立了篮球队，我和徐静进了局队，仍然打后卫。厂女篮教练焦师傅升任局女篮教练。我们脱产到市水泥制管厂集训了一段时间，就参加市里的篮球比赛。

在体育队里的生活简单愉快。训练，比赛，吃饭，睡觉，再就是海阔天空地闲扯淡，说笑话，别无牵挂。我们队的其它战绩不错，但是经常打不过纺织城队，他们有文革中下放到厂里的原省队队员。

建材厂的工会干部常红兵原名常吉祥，在文革中为了表忠心改了名字。开展群众体育运动是工会的工作之一，厂篮球队员进入局篮球队也让他和局领导有了更多的沟通机会。

我的右脚崴了，脚腕痛得不能踩地，医生用绷带固定让我休息。我坚持上班，但是有两场局队的球赛没有参加。常红兵埋怨我没有去打球，让他没有办法给局里交代，影响了他的前程。结果我拆了绷带上场打球，从此右脚踝落下慢性伤痛。

有一次我们在外面集训，回厂打邀请赛。常红兵对男篮比赛不满意，勒令停赛，严加训斥，要球队马上开车回集训点。教练说要等一下比赛完正在冲澡的女队。他专横地喊：“不等，你们开车马上走，让女队自己走回去。她们必须自己走回去，参加明天早上的晨练。”当我们急忙赶出来时卡车已经走了。悲愤让我感到窒息。我们走了十几里荒郊野外的夜路回到集训地。我们不是谁的家奴，人的自尊让我下决心找机会离开建材厂。

内蒙牧区赤脚行医的经历

不久73年大学招生的章程下来了。吸取了72届的教训，73年的招生录取需要经过考试。我们工厂得到的是西安医学院的名额，厂里又推荐我上大学。这是我离开建材厂、改变命运的绝好机会。我对73年的大学招生深抱期望，医学院的招生也唤起了我对童年和内蒙牧区插队的记忆。

我是1951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出生

的，接生医生是著名的妇产科医生林巧稚。母亲生姐姐时难产，实行了剖腹产。林大夫建议妈妈第二胎试试自然产，对母婴都好。但是一天一夜过去了，生产不顺利，还是决定剖腹产。由于产程太长，为了不影响我将来的智力，决定手术不用麻药。妈妈忍受了极大的疼痛，让林大夫用最精湛的技术把我挖了出来。林大夫又对妈妈精心地进行产后康复护理。妈妈对这位杰出的女性充满敬佩和感激之情，对她说希望我长大能像她一样做一个优秀的妇产科医生。

母亲对我的期望被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动荡偏狂的社会使我们对自己的命运没有了掌控的可能，但是乱世也锻炼出我们可以承受艰辛的勇气。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北京第一批有组织的插队地点是内蒙牧区，第一批插队的学生是66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我知道如果我不下乡，关在大学牛棚里的妈妈会罪加一等。抱着直面人生、别人能活我就能活的信念，17岁的我踏上了锡盟草原。（妈妈后来的经历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当看守牛棚的红卫兵们看到我信里描述的牧区生活和如何掐死满身的虱子时，惊异地张大了嘴巴大喊“天呐”。从此以后，她们对母亲的态度和缓了许多。大概是觉得她离劳动人民更近了，离革命更近了吧。）

到内蒙以前，牧区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一方面异域的风情吸引着变得敢于冒险的我，另一方面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也在考验着我。我需要准备生存和自救的基本知识和物品。我向一个同学的祖母学习了针灸的进针和行针法；向姨家的老邻居，一个气功师，学习了一点按摩和急救方法；又买了一些中西医的书籍和针灸用品，还带了一些常用药品到草原。

草原的雄浑辽阔震撼了我的心，同时草原上缺医少药的实际状态也对我有很大的触动。公社卫生所只有两个医生，两个护士。全公社有4个生产大队，我们一个大队的108个牧民游牧在东西60里南北120里的草原地带，离公社的最近距离也要有40里。牧民有病很难得到及时的医治。

到了生产队以后，经常有牧民给我讲他们的病痛。自带的日用药品很快就给牧民分完了。在放牧中，在夜晚蒙古包的油灯下查看医书，熟悉经络穴位，成了紧迫的需要。带的针灸器材也派上了用场。

你不经心地帮了一个人，就有十个二十个人来找你。我没有药了，常常看着牧民抱希望而来，带失望而归。

和公社医生几个回合的谈判有了进展，我得到了一些常用药，可以把药发给队里有病的牧民，同时把药品账交给卫生所。医生出诊到队里时，也会让我负责日后每天给病人的打针注射。放牛之余给人看病，我乐此不疲。

当时内蒙牧区和全国一样在大搞阶级斗争。成分不好的牧民很受歧视，王爷的家属更是猪狗不如。医生是要实行人道主义精神的，我对有病的牧民一视同仁。送医送药增进了我和牧民之间的信任和友谊，也促使我更努力地学习蒙语，学习医学知识。

在冬营盘牧民住得很分散，有时去一家看病人要骑马走两个小时。白天照顾牛群不能远离，傍晚把牛群安顿好以后才好上路。茫茫草原上除了几条大车轧出的道没有什么路，太阳下山后四处漆黑，只有天上的星光闪亮。我常常是把药盒绑在腰带上，看准一颗星星当方向标骑马走下去。估摸着快到了就纵马放缰，靠着老马识途找到蒙古包，居然也没有走丢过。

走夜路就怕马突然遇到地上的牛羊白骨受惊，那时必须用腿夹紧马肚，及时控制马匹。要是马踏进鼠洞失了前蹄，你滚到地上也要握紧缰绳，在草原上跑失了坐骑会狼狈不堪。但是如果人掉下来，脚挂在蹬子上，就九死一生了。受惊的马会把你拖得天女散花，尸骨难寻。我跌过几次马，还好都有惊无险。

离我住地几十里以外有一个来自西苏旗的部落。由于当地草场沙漠化，他们在此游牧救灾。听说有知识青年会针灸治病，就派人来找我。当我骑马跟随来人走到离他们营地几里远时，就看到几十匹马载人飞奔而来，簇拥着我，浩浩荡荡进入他们的营地。草原上没有即时通讯工具，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守望着我的到来。我被他们的真诚感动了，在一群人的陪伴下，一个蒙古包一个蒙古包地去给病人针灸治病。他们拿出最好吃的奶皮子、奶豆腐款待我，一再挽留。这就是蒙古人，你帮助他们一点儿，他们愿把整个心掏给你。

我去义诊的消息不胫而走。出远门找寻马匹的知青告诉我，几百里外辉腾

梁的人也知道我会针灸的事。我感到很惭愧，自知功力浅薄，渴望自己有一天成为名副其实的医生，用最好的医术帮助更多的生命。

努力争取，但医生梦仍付之东流

草原和马背上的药箱已经渐行渐远，尘封的记忆又被医学院的招生打开了。我在工厂的推荐名单里，我的医生梦，我妈妈的期望能够实现吗？我鼓足了劲，积极准备招生考试。

我没有等到考试和体检的通知，局里把我的报考扣压了。有消息说局里另外一个厂分到了西安交大锅炉专业名额。该厂一个女工的父亲是西安医学院某系的主任，经常给局领导开好药。局里要把建材厂医学院的名额转给那个女工。这是一盆冷水，但是没有浇灭我的希望，我决定不放弃，去建材局当面询问，以理抗争。

我到了紧邻西安市中心的建材局，找到政工组负责人，提出参加大学考试的要求。他不停地对我绕着弯讲大话，又不断暗示我的出身不好，上大学是有政审要求的。我从来没有因为我的出身感到羞愧，但无意跟他纠缠出身问题，就说“主席说了重在表现。既然我们厂连续两年推荐了我，就是认可我的表现。局里不了解我，如何评价我的表现？我要求有参加考试的权力，考不上是我的事，不让我考是局里的错误。”辩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不打算屈服于威胁和说教，据理力争。政工干部理亏词穷，我最终争取到了参加考试和体检的权利。我以全局考生成绩第一结束，却又因为张铁生的考试白卷让我的医生梦付之东流。

虽然张铁生的白卷让局政工组的计划得以实现，辩论的失败还是让他们恼羞成怒。局里沿着我插队走过的路开始进行大调查，企图找到我走后门或有什么其它问题的证据。我准备好了应对最坏的局面。全局考生中成绩最好已经证明了自己。不管面临什么压力，我对将来充满信心。

我的战斗准备最终没有派到用场。在大规模反对走后门运动中不断有恶性人命事件，最高指示的一句话，“走后门的也有好人”让局领导拾阶而下。而我继续在实验室里做我的化学分析。

72年大学选择了我，我没去。73年我选择了大学，没去成。对于上大学我心如止水。事业可以选择你，你却选择没有自由。但是即便不能上大学，我也不会停止对知识的追求，不会放弃对命运改变的索求。

——待续——

(版权文章，未经许可，不得转载。)